

比较

COMPARATIVE STUDIES

34

吴敬琏 主编

钱颖一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两个观察

郭树清

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的挑战

季卫东

从博弈行为和机制设计看中国法律秩序的特征

哈罗德·德姆塞茨等

中国的竞争政策与反垄断法

李稻葵

我们面临什么样的金融风险

普拉纳布·巴丹

中印的贫困和不平等

查克拉瓦蒂·拉姆-普拉萨德

令人失望的印度中产阶级

阿比吉特·班纳吉

创建一种新的发展经济学

菲利普·阿吉翁 斯蒂文·德劳夫

从增长理论到政策设计

考希克·巴苏

旅游者的困境

青木昌彦

经济交易与社会交换的关联博弈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F0-53/19

:34

2008

比较

34

C O M P A R A T I V E S T U D I E S

吴敬琏 主编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比较. 第34辑/吴敬琏主编.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8. 1

ISBN 978-7-5086-1070-2

I. 比… II. 吴… III. 比较经济学 IV. F299.2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95195 号

比较·第三十四辑

主 编: 吴敬琏

策 划 者: 《比较》编辑室

出 版 者: 中信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东外大街亮马河南路 14 号塔园外交办公大楼 邮编 100600)

经 销 者: 中信联合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承 印 者: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0.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86-1070-2/F. 1272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5322521

<http://www.publish.citic.com>

010-85322522

E-mail: 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

卷首语

2008年的中国有许多盛事，作为一向站在倡导经济改革开放一方的《比较》，目光聚焦在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许多部门、研究机构和个人早已着手总结、研究或撰写有关改革的回忆录了。不过，如何能做到不误读历史，从来就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不久前，周小川在50人经济论坛上有一个非常简短的发言，大意是指：如何更好地汲取历史事件的经验和教训，才能给我们以启示？第一个就是要加强学术的讨论，尤其要防止一些主观上的知识引导对历史的错误解读。特别是，诊断具体问题并给出处方时，要避免误读历史，要尽可能避免矫枉过正而导致当下政策的误用，避免给下一次危机埋下导火索。第二，在分析问题时，我们终究都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流派的经济理论进行分析和推敲，应该尽量避免过于个人色彩的倾向，这样才能把问题看得更客观一点，更清楚一点。我们认为，十七大报告强调“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回顾历史，不能误读历史就是十分重要的议题，只有总结了正确的改革开放历史，才能知道下一步改革的方向和步骤究竟是什么，该如何做。

钱颖一对此有两个观察。第一个观察是，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迎来了一个空前繁荣时期，这是一个好消息，但也有可能带来自满和盲目，进而造成改革难以起步。空前繁荣还使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利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变得更大，这也是推动改革困难重重的一个原因。第二个观察是，改革遇到了对“发展与公平”认识上的误区，因为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不是简单的互相替代关系，在很多情况下它们是互补的。“所以，改革开放不仅是发展之路，而且当我们关注公平的时候，也应该用改革的思路来思考问题。”

郭树清则从中国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角度思考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经过30年的对外开放，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紧密程度，可能已经大大超过了我们的想象。近来大家所关注的物价、金融、房地产等很多领域的情况几乎都是与全球经济紧密相关的。文章特别强调，中国经济所取得的巨大进步和成就是改革开放的结果，“现在社会上出现了一些反对对外开放、否定对外开放的声

音，这是完全无视历史事实的错误主张，如果这种意见占了优势，势必将中国引领到歧路上去。”

著名法学家季卫东教授《从博弈行为和机制设计看中国法律秩序的特征》站在一个更长远的历史视角来透析中国法律秩序的特征，以便为中国法律制度改革提供更切实可行的思路。作者认为，中国的法律秩序始终以一种很特殊的情境设置为前提，那就是中国自历史上就采取了“有产政府”的制度设计，政府积极介入市场并直接参与交易，官僚成为经营者，政府成为营利机构。这种传统的财产权结构使得中国要建立一个以法治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法学范式就不得不有所修正和创新，立法者不得不在“权源之束”的网络结构里进行各种组合样式的优化选择，并按照这样的方针来考虑适当的机制设计。

《中国的竞争政策与反垄断法》来自2007年10月13~14日由北京大学莫里斯经济政策研究所主办的“中国的竞争政策与反垄断法”学术研讨会。文章汇集了法与经济学领域的权威学者哈罗德·德姆塞茨与亨利·曼尼、欧盟委员会竞争总局前首席经济学家拉尔斯-亨德里克·吕勒、国内监管领域的专家张昕竹、北京大学莫里斯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蔡洪滨等人的主题演讲。他们就中国反垄断法现状、当前的产业结构、市场支配地位、知识产权保护等多个主题进行了讨论，尤其着重于中国反垄断法的操作与实施。德姆塞茨认为，中国的反垄断法草案反映了一种普遍的认识误区，即公共政策可以影响竞争强度，似乎竞争就像室内温度一样可随意调节。他还指出，法院与政府不独立将是中国实施反垄断法过程中可能遇到的特殊问题，另外，负责调查和起诉违法行为的政府机构，很可能同时也负责裁决这类起诉。这极可能造成权力的滥用，尤其中国政府在企业中还有经济利益，反垄断法很可能被用于保护有关系的企业。

亚洲金融危机10年、美国次贷风波、人民币升值压力不断加码、金融资产和地产价格泡沫隐现，引起了国内外舆论对中国未来金融风险的担忧，未来几年，我们究竟会面临什么样的金融风险，国际因素对我们到底又有多大的影响？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金融系主任李稻葵的《我们面临什么样的金融风险？》一文对此给出了回答。他认为，中国更有可能面临的是“日本式”的金融风险，即经济过热、国内消费不足导致的国内货币长期面临升值压力，引发投机性资本涌入国内，从而形成国内资产价格泡沫，当资产价格泡沫破裂以后，国内实体经济受到严重打击，导致危机。对于这种可能的金融风险，李稻葵提出了相应的防范机制：控制企业的金融风险；从总体上把握宏观金融风险；建立防火墙，特别是切断银行与资本市场的影响机制，同时还要提高微观市场机制的灵活性，尤其是劳动用工制度。文章还讨论了国际经济新秩序对中国金融风险可能的影响。

印度，是一个始终争议的热门，过去几年《比较》各辑也持续刊登过一些研究印度的论文。本辑“比较之窗”提供了三篇有关印度的文章，期望用相对轻松发散的方式，在2008年之初开一个新样式，达成“以比较传递理念、思想和智识”。《解读印度》是我们邀请到过印度的专家学者，给出自己对印度的观感。这些观察结论不尽相同，有的甚至截然相反，但对于大家深入认识印度，以及弄明白为什么要了解印度都有帮助：丁宁宁两次到访印度，他认为“印度站在加速增长的门槛上，但假如没有大量支持，它是跨不过这道门槛的。”王一江指出了“我们知道什么样的政府政策可以使国家经济不发展”的命题；李稻葵划分了印度的“三个世界”；高西庆认为印度的多元和可选择性都使它的未来是积极光明的；而崔之元关注印度的非政府组织如何反对建立经济特区；领导一个印度研究中心的查建英女士，则从文化角度看印度。

伯克利加州大学的普拉纳布·巴丹教授从全球化的角度分析了中国与印度的贫困和不平等。他的一个基本论点是贫困、不平等与全球化之间并无显著联系。从政策的角度而言，需要在信贷、劳动力市场以及社会和经济基础设施方面采取辅助措施，减轻全球化给一些穷人带来的潜在负面影响。

众多有关印度崛起的评述，都不忘提及印度正在兴起的中产阶级。这个中产阶级是否如外界所说的那样，是一支朝气蓬勃、引领印度走向世界舞台的生力军？英国兰开斯特大学比较宗教和哲学教授查克拉瓦蒂·拉姆-普拉萨德的看法却不这么乐观。在《令人失望的印度中产阶级》一文中，拉姆-普拉萨德教授辛辣地指出，印度中产阶级的公民意识非常薄弱，对贫困阶层没有责任感；他们对政治不感兴趣，认为政治不过是一种精神上的需求，而不是事关国计民生的当务之急；他们自称成功来自自己的奋斗，政府在印度中产阶级兴起中没有什么用，也不认为印度政府有能力解决社会问题。这样一个中产阶级无法推动印度社会的政治变革。相反，真正的推动力量可能来自那些刚刚脱离贫困、没有机会进入消费阶层的印度穷人，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政治行动来改善生存状况。

《机器的内部：创建一种新的发展经济学》是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阿比吉特·班纳吉对当前通行的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一次拷问。自法国著名经济学家兼外科医生魁奈提出了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经济永动机理念以来，经济学家和发展专家们一直以机器的思维模式来思考问题，他们总是在寻找合适的按钮。比如说教育，经济学家把它看做是启动经济发展的一个按钮，而为了推动教育，还有许多的按钮，例如经济学家会谈放权、激励机制、教育券以及竞争；教育专家谈教学法；政府官员则喜欢拿师资培训说事。作者认为，大家之所以非常喜欢这些按钮，是因为有了它们，可以免去深入机器的麻烦。

而经济学要想取得更大的进展,就必须打破既有的思维模式,深入经济机器的内部去展开探险,了解所有的细节,找到改善细节并推动机器运行的思路。作者在文中还提供了有关印度教育状况的许多现实情况。

哈佛大学菲利普·阿吉翁教授和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斯蒂夫·德劳夫教授的《从增长理论到政策设计》一文试图在新增长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一个能够给出政策建议的增长回归模型。因此,文章回顾了新增长理论的AK范式、熊彼特范式、产品多样化方式以及由哈佛大学的丹尼·罗德里克教授等人提出的增长诊断理论;讨论了增长回归模型中可能遇到的方法论问题及其处理方法。作者还利用增长回归模型对欧洲与美国、拉丁美洲与亚洲近期的经济发展差异,从政策角度进行了比较分析,并得出了一个初步结论。

本辑《比较》尝试开设一个新的栏目“视界”,为读者提供由一流经济学家撰写的通俗经济学文章,以领略经济学家思考问题的方式,开启看问题的不同视野。康奈尔大学的考希克·巴苏教授,不仅在法和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方面深有造诣,也是博弈论的高手。在《旅游者的困境》一文中,他设计了一个“游客困境”博弈,挑战传统经济学中的自由意志假说,以及强调理性思考的逻辑悖论。无论是理论推导还是实验室的实验结果都表明,在“游客困境”博弈中,博弈者都没有按照“理性”规则出牌,但却得到了更好的收益。这个反常的结果,给博弈论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挑战,要求以数学技巧取胜的博弈论研究进行更多创造性的思考。在巴苏的笔下,一个艰深的博弈论问题变为日常的生活现象,让我们一窥其中的奥秘。

“前沿”栏目是青木昌彦教授最新的研究论文《经济交易与社会交换的关联博弈:从社区规范到企业社会责任》。文章开辟了一种新的方法,来分析诸如社会规范、社会资本、社会地位之类的社会概念与经济分析之间的关系。这种方法既不同于把社会概念当成经济分析的外生因素的二分法,也不同于利用博弈论的内生法,相反,它是将经济学和社会学方法结合在一起的博弈论方法,作者称之为“第三条道路”。

目前中国的环境保护制度建设大多建立在对西方制度和理论的学习与借鉴上,但是,在借鉴国外经验构建本国制度的同时,如果没有深入理解中外体制的基础性差异,就很难建立起贯彻制度的执行能力。霍普金斯大学教授丹·古特曼和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宋雅琴的《中美环境治理体制比较研究》从环境治理体制的理念、法律体系、中央与地方关系以及信息和资源四个方面,比较了中美两国的环境治理体制,为我们下一步的环境治理体制建设提供了参考。

目 录

Contents

第三十四辑

- 1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两个观察 钱颖一

Two Observations about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by Yingyi Qian

- 5 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的挑战 郭树清

Challenges of China's Integration into the World Economy

by Guo Shuqing

法和经济学

Law and Economics

- 13 从博弈行为和机制设计看中国法律秩序的特征 季卫东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Legal Order: A Perspective of Game Behavior and Mechanism Design

by Ji Weidong

- 21 中国的竞争政策与反垄断法 哈罗德·德姆塞茨等

China's Competition Policy and Anti-monopoly Law

by Harold Demsetz et al

金融评论

Financial Review

- 31 我们面临什么样的金融风险 李稻葵
Serious Financial Risks in China *by Dao-kui Li*

比较之窗

Comparative Studies

- 42 解读印度 《比较》编辑室
Understanding of India *by th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tudies*
- 58 中印的贫困和不平等：与全球化的微弱联系 普拉纳布·巴丹
Poverty and Inequality in China and India: Elusive Link with
Globalization *by Pranab Bardhan*
- 66 令人失望的印度中产阶级 查克拉瓦蒂·拉姆-普拉萨德
India's Middle Class Failure *by Chakravarthi Ram-Prasad*

发展经济学

Development Economics

- 75 在机器的内部：创建一种新的发展经济学 阿比吉特·班纳吉
Inside the Machine: Toward a New Development Economics
by Abhijit Banerjee
- 88 从增长理论到政策设计 菲利普·阿吉翁 斯蒂文·德劳夫
From Growth Theory to Policy Design
by Philippe Aghion and Steven Durlauf

111 视界

Horizons

- 旅游者的困境 考希克·巴苏
The Traveler's Dilemma: In the Lab and Upon Introspection
by Kaushik Basu

119 前沿 **Guide**

经济交易与社会交换的关联博弈：从社区规范到企业社会责任

青木昌彦

Linking Economic and Social-Exchange Games: From the Community
Norm to CSR *by Masahiko Aoki*

135 CIDEG专栏 **CIDEG Column**

中美环境治理体制比较

丹·古特曼 宋雅琴

Comparing America and China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Systems

by Dan Guttman and Song Yaqin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两个观察

钱颖一

我的发言还是以经济改革为主。关于经济改革，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被引用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我的理解是，中央在继续改革这个问题上决心极其明确，改革开放不能停步，不能倒退，而且要前进，因为不进则退。不过，在我看来，具体如何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如何落实改革开放就不那么容易了。这是因为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新的时期，有一些新的问题，所以我想今天利用这个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两个观察。

第一个观察，目前或许是我们推动 经济改革的一个困难时期

原因是空前的繁荣——GDP 增长连续多年超过 10%，今年超过 11%，企业的利润大幅度上升，仅国有企业今年可能就有近万亿元的利润，财政增收可能达到 1.2 万亿元，上市公司市值更不用说。世界上十大市值公司在中国

* 本文根据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系教授钱颖一在 2007《财经》年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编者注

就有五个，中石油是世界上市值第一大的石油企业，中国移动是世界上市值最大的电信公司，中国工商银行是世界上市值最大的银行，中国人寿是世界上市值最大的保险公司。

当然，这些都是好消息。不过，从改革的角度讲，也许也有另一层含义。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只有危机才能催生改革。最好的例子是印度，1991年的金融危机导致了其后大幅度的改革。事情可能不必这么极端。我认为，还有另外一种情况也可以催生改革，那就是“危机感”能够催生改革。30年前，当邓小平推动中国经济改革的时候，就是那一代领导人的强烈危机感，他们有一种不改革就要被开除球籍的危机感，才开启了中国全面的改革。

最近的例子是三年前，银行业面临着中国加入 WTO 之后的开放所带来的危机感，所以，促成了中国银行业的深刻的改革，才有了今天的繁荣。今天的繁荣是好事，但如果我们盲目乐观，不知道自己的位置，没有危机感，就会对改革造成一种由我们自己造成的阻力。

我觉得“危机感”应该来自于我们对目前繁荣的正确认识和判断。从全球范围来看，我们仍然处在一个比较低的发展水平，仍然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均收入按照市场汇率计算大约为 2 000 美元，是一个成就，但是离全国小康还有很大距离。世界银行最新的有关购买力评价的国际比较研究即将发布，有可能将中国的按购买力平价的人均 GDP 在原来估计的基础上缩减 40%，这仍然远高于按市场汇率计算的中国人均 GDP。我们的后面有越南，特别是印度的追赶。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仅仅初步建立，离一个基于法治的、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有很大距离。经济体制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些都应该使我们有危机感。

空前繁荣还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就是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利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变得更大。部门利益也是造成推动改革困难重重的一个原因。比如我们的财政收入已达到空前的水平，我们有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好的财力。但是每项改革都需要各个部门之间的利益协调，而这种协调的难度如今无疑是增大了。从卫生改革、金融改革、价格改革，到电信行业重组中我们都可以看到部门利益的冲突。因此，我们非常需要下一届政府认真考虑是否能够设立一个超越部门利益的机构，从事改革方案的设计和组织协调工作。过去的体改委、体改办在某种程度上曾发挥了这样的作用，但是在上一届政府中，体改办并入了发改委。当然是否恢复体改委另当别论，这里重要的想法是为了推进改革我们应该在政府层面做一些制度上的安排，以减少改革的成本。

第二个观察，改革遇到了对“发展与公平”认识上的误区

改革遇到了对“发展与公平”认识上的误区，这也是由于新时期的新变化而产生的。在新时期、新阶段带来了新变化，我们不仅要注重效率和发展，还要关注公平。这就产生了一种认识，以为改革是为了发展，而发展与公平是对立的。所以，在我们关注公平的时候，减少改革的力度应该成为自然。我认为这是一个误区。

改革的精髓是很简单的，在我个人看来就是十一个字“把激励搞对，让市场起作用”。也就是要给个人、企业更多的活动空间，让市场运作起来。世界各国的历史，包括中国自己改革开放前后的对比，都表明这是唯一使经济发展、效率提高的道路。

我们的计划经济的历史，就决定了改革的大方向一定是要减少政府的行政干预，给个人自由，为企业松绑。如果说 50 年前这还只是理论上的争论，因为那时不仅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在效率上谁胜谁负还未定，即使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在经济中的制高点作用也还争论不休。高税收、严管制、国有制也曾被认为是市场经济中提高效率的重要手段。但是 1980 年后的历史已经用事实给出了结论，只有市场经济才有效率，才能发展。

虽然人们现在大都接受市场的效率优势和对发展的作用，但同时人们似乎也都在接受这样一个命题，就是效率和公平之间总是存在着“得失替代”（tradeoff）。所以由此得出“关注公平就要牺牲效率”的结论是理所当然的。

既然改革有利于推动效率和发展，改革与公平就是对立的，发展与公平也是对立的。我认为这是一个误区，因为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不是简单的互相替代的关系，不错，在某些情况下，它们之间有对立的替代关系的一面，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它们是互补的。实现公平的目标有各种各样的途径，其中直接的、显而易见的方法往往都是成本较高的方法，而且会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后果。但是，无论是理论还是各国的经验都表明，通过改革、通过提高效率，往往会产生成本较低的方法达到公平的目的，而且有时甚至是可以达到既改善公平又提高效率的结果。

下面我举两个例子来说明。

第一个例子，收入分配差距的问题。造成收入分配差距的有很多原因，经济学家发现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教育程度的不同，因此，如果仅仅通过

对收入的再分配来缩小差距,那么它会导致效率的低下,因为人们就会没有激励投资自身的教育。相反,如果我们创造一个良好的教育环境,提高所有人的教育水平,这样就既可以达到机会的公平,又可以提高效率,还可以改善收入分配结果的公平。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第二个例子,是对劳动者保护的问题。最近英国经济学家贝斯利(Timoty Besley)和伯格(Robin Burgess)研究了印度在1947年的《产业争议法》出台后对经济的影响,这一法律对解雇做了严格的规定。这两位经济学家用印度“各邦”的数据来进行比较研究,看这一法律对劳动力市场干预的结果,他们有两个主要的发现。^①

一是对劳动力市场干预较大的邦,制造业的发展在此后比较慢,而干预较小的邦发展则比较快。有趣的是,对劳动力市场干预较大的邦恰好是过去制造业曾经较为发展的地区,因为那里的工会的势力比较大,所以在联邦的法律上又加了一层,而几十年后他们制造业的发展反而滞后于过去落后的地区。

他们的第二个发现是关于劳动者自身利益的,毕竟立法的动机是为了提高劳动者的收益,如果牺牲一点发展换来劳动者利益的提高,也许是值得的。但是他们发现,并不是这样。立法管制过严的邦,劳动者收入也受损失,失业更为严重。这个研究说明了即使动机是好的——想提高劳动者收入,但是如果使用了不恰当的方法,结果既牺牲了效率也没有带来公平。这就是为什么自1991年来印度的经济改革中放松了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所以,改革开放不仅是发展之路,而且当我们关注公平的时候,我们也应该用改革的思路来思考问题。

① 具体内容可参见蒂莫西·贝斯利和鲁宾·伯格:《劳动力市场监管对经济发展的阻挠——来自印度的数据》(Can Labor Regulation Hinder Economic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India, by Timothy Besley and Robin Burgess),《比较》第26辑,中信出版社2006年9月出版。——编者注

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的挑战

郭树清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的挑战”，这个挑战不只是对中国的挑战，也是对世界的挑战。

最近我从英国《金融时报》看到几条消息，我这里想跟大家一起分享。第一条消息说，从明年起，由于美国经济不景气，中国可能成为世界经济最大的发动机。对这个消息我不太吃惊，因为从实体经济来看，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可能从2004年或更早一些时候开始，中国在世界经济增长中发挥的带动作用就是最大的了。第二条消息，是一个问卷调查，调查的问题是，从现在起到2020年哪个国家在经济上可能会占据主导地位。抽样的国家包括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德国、美国6个国家。结果是，其中一半的国家，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认为在未来的20年里，中国在上世界上占主导地位；另外一半认为，美国和中国共同占据主导地位，两者的份额差别不大，美国略多一点。这让我稍微有一点吃惊。第三条消息，就更令我惊讶了。这也是一个调查，问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中国应该被视为是本国的伙伴还是竞争对手？同样是前述的6个国家，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德国和美国。参加抽样调查的人，居然有超过一半的人认为中国是竞争对手，不是合作伙伴，平均只有25%的人认为是合作伙伴。这样的调查结果非常出乎我的预料。

* 本文是作者2007年12月10日在《财经》年会晚宴上的主旨演讲。

不管怎么说,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紧密程度,可能已经大大超过了我们的想象。我们大部分的同胞可能压根儿就没有想到,我们的经济生活会对外国有那么大的影响,而实际情况表明这种联系确实非常紧密,甚至可以说,如此紧密的联系是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当然,如果仔细阅读历史可以发现,至少曾经有两次全球化对中国经济产生过深刻影响。最早在汉唐时期,中国与中东、欧洲通过丝绸之路建立起了密切的联系;随后是在明清时期,在美洲大陆发现以后,中国与美洲、欧洲也有紧密的往来。这个影响比过去的历史教科书所告诉我们的要大得令人难以置信。比如土豆、马铃薯、玉米的引进,使中国的人口和经济规模都增加了很多倍,中国人爱吃的辣椒也是从国外引进的,它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饮食习惯。诸如此类许多看似不起眼而实际上与我们现今生活密切相关的东西,都是上一次全球化的产物,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大。更需要提到的是,上次全球化时,中国已有过连续数百年的贸易顺差,持续的白银流入,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货币体系和经济规模,而且,东南沿海,特别是“长三角”与“珠三角”那个时代已经是高度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但是尽管如此,比较而言,可能还是当前我们面临的这次全球化带来的变化更大。近来大家所关注的物价、金融、房地产很多领域的情况都说明了这个问题。物价上涨不仅是中国在涨,外国也在涨,而且粮食、石油、矿石、运输费都在涨,流动性造成的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的价格上涨,几乎也都是全球性的。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看起来如同我们国内省与省的联系、县与县的联系。很难想象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再能分开。

一、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世界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

我们分别举几个简单例子就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个趋势难以逆转。

从制造业产品来说,中国现在的制造业大约 1/4 需要出口,如果不出口,生产出来的这些产品就找不到市场。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制造业对进口的依赖程度更大,进口的绝对额不如出口额高,但是实际上进口的影响作用更大,因为我们生产的产品大部分需要使用进口的技术以及机器和设备。

在能源方面,从今年开始,中国石油消费量的一半需要进口,不进口根本无法满足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要求。

在原材料方面,铁矿石有一半是进口的。中国今年的钢铁产量要达到 5 亿吨,无论是绝对额还是增速都史无前例。同样,除铁矿石之外,还有其他

很多有色金属要依赖进口。

在食品方面，食用油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性最大。目前，全球大豆的贸易量一年 6 000 多万吨，中国进口 3 000 多万吨，占了一半。有人说我们生产的粮食不少，把土地拿出来一小部分种油料作物不就可以解决了吗，问题是这部分土地种油料作物以后粮食又少了。

在金融方面，今年中国的贸易顺差，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合计预计超过 4 000 亿美元，外汇储备也就新增 4 000 亿美元。这在所有的国家中，无论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是最多的。中国是最大的直接投资目的地之一，与此同时，中国持有外国的国债或者机构债等都是最多的，与国际金融市场的联系毋庸赘言。

在劳动力市场方面，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联系也比较紧密，在全球新增加的专业技术岗位最多的地区是中国，包括香港。而相比世界其他地方更是这样，欧洲、美国许多部门总体上都在裁员。

中国经济连续 30 年保持了平均 9.7% 以上的高速增长，成就举世公认。1978 年我们的外贸总额才是 206.4 亿美元，今年预计达两万多亿美元，相当于过去的 100 倍。如果这不是世界奇迹，就不会再有其他的奇迹了。

必须承认，这个世界奇迹的取得是我们对外开放的结果，没有对外开放，中国经济的进步是无法想象的。现在社会上出现了一些反对对外开放、否定对外开放的声音，这是完全无视历史事实的错误主张，如果这种意见占了优势，势必将中国引领到歧路上去。当然，中国经济的发展根本上是中国人民辛勤劳动的结果，但是没有对外开放，我们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这样的成就。改变对外开放的趋势不仅违反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违反世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在过去许多年里，为世界提供了大量物美价廉的商品，又为世界提供了巨额的低成本资金，没有这个因素，世界经济不大会有这么一段美好时光。

二、我们共同面临的难题

在此我想再次强调，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难题。这意味着，中国不可能单独解决这些问题；但是没有中国，世界也同样解决不了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正视这些共同的问题，找到合作的方式与途径，实现互惠共赢。